

目 录

胡 适

《努力周报》发刊词：努力歌	胡 适(2)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胡 适(5)
胡适与辞书	季维龙(18)
论胡适接编后《每周评论》的政治方向	张德旺(21)
论胡适的编辑活动	黄勤堂(28)
胡适与《鲁迅全集》的出版	余越人(36)
胡适与《独立评论》	蒋金戈(42)
胡适和上海亚东图书馆	徐雁平(50)
《胡适研究丛录》序言	王子野(54)
胡适之与商务印书馆	邓云乡(59)
胡适——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面旗帜	杨 雯(61)
胡适与《竞业旬报》	刘练军(72)
胡适编辑思想与实践	徐希军(81)
存目	(87)

舒新城

舒新城和《辞海》	舒 池(91)
----------------	---------

同舟风雨话当年

- 忆舒新城先生 陶菊隐(99)
- 老《辞海》是怎样编成的 周颂棣(111)
- 舒新城与陆费逵 舒绍祥(117)
- 老《辞海》主编和中华书局编辑所长舒新城 王建辉(120)
- 《辞海》的编纂和修订 巢峰(125)
- 我国辞书出版史上一件珍贵的史料 方厚枢(155)
- 存目 (158)

叶圣陶

- 我和商务印书馆 叶圣陶(162)
- 记我编《小说月报》 叶圣陶(165)
- 我们的宗旨与态度 叶圣陶(166)
- 谈谈开明书店 叶圣陶(170)
- 叶圣陶和编辑工作 叶至善(172)
- 叶圣陶与编辑工作 彭加瑾(176)
- 叶圣陶语文教材建设的思想和实践 田小琳(195)
- 怀念圣陶先生 吕叔湘(204)
- 悼念我最尊崇的叶圣老 苏金伞(210)
- 道德文章 一代师表

- 缅怀叶圣陶老人二三事 曹治雄(218)
- 叶圣陶和《辞书研究》 尚丁(222)
- 叶圣陶与“当年”文坛新秀 王知伊(228)
- 涓泉归海

- 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叶圣陶先生 陈大庆(232)
- 叶老和《中学生》 欧阳文彬(257)
- 于平凡处见精神

- 回忆编辑工作中的圣陶老人 姚涌彬(270)

“荒歉”年代文坛的丰碑

- 叶圣陶主编《小说月报》述评 商金林(276)
- 怀念叶圣陶 浩然(295)
- 叶圣陶编辑思想探讨对编辑学研究的启示 邵益文(309)
- 语言大师叶圣陶 俞筱尧(317)
- 教材编辑中的“大”与“小”
- 叶圣陶先生从事教材编辑工作的片断回顾
- 杨惠龙 王 刚(331)
- 存目 (338)

孙伏园

- 理想中的日报附张 孙伏园(345)
- 从晨报副镌到京报副刊
- 1925年(民国十四年) 伏 园(350)
- 三十年前副刊回忆 孙伏园(355)
- 尊重老作家,培养新作者
- 从孙伏园的编辑工作谈起 陈漱渝(357)
- 孙伏园与鲁迅 陶静波(360)
- 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 任嘉尧(365)
- 一个“笑嘻嘻,善于催稿”的编辑
- 鲁迅与著名报人孙伏园 王德林(370)
- 孙伏园:杰出的副刊编辑 郝 雨(382)
- 中国副刊的革新者孙伏园
- 以此纪念他的一百周年诞辰 陈漱渝(387)
- 孙伏园时期的《晨报副刊》 张涛甫(395)
- 存目 (408)

邹韬奋

本刊与民众	邹韬奋(411)
“生活”周刊究竟是谁的?	邹韬奋(412)
“生活日报”创刊词	邹韬奋(414)
聚精会神的工作	邹韬奋(416)
一个小小的过街楼	邹韬奋(418)
几个原则	邹韬奋(420)
主持事业最主要的基本态度	邹韬奋(422)
关于服务的态度	邹韬奋(425)
韬奋经历的道路	沈粹缜(437)
徐伯昕的《遗言记要》是韬奋遗嘱的原始版	邹嘉骊(439)
韬奋先生的一生	徐伯昕(449)
邹先生我见过一面	王仿子(469)
新闻出版工作先驱邹韬奋	刘景华(472)
临终前的韬奋先生	徐雪寒(491)
韬奋的编辑思想	雷群明(496)
邹韬奋与周恩来忧时救国成知己	穆欣(510)
“与黑暗势力作殊死战”的斗士 ——纪念邹韬奋诞辰百周年	吉少甫(526)
事业发展的力量源泉 ——邹韬奋同志领导生活书店工作的经验	赵晓恩(540)
一位革命知识分子的选择 ——纪念邹韬奋诞辰一百周年	胡绳(551)
韬奋先生拒贿	小艺兵(556)
邹韬奋“读者中心观”及其实践	孙景峰(558)
韬奋精神再学习	马仲扬(568)

最是英雄少年时

——邹韬奋怎样编《生活》周刊 徐柏容(573)

沿着韬奋的足迹 江曾培(585)

存目 (589)

胡 适

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1905年到上海中国公学读书。1910年赴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康乃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1917年毕业,获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五四运动初期,提倡白话文、新诗,倡导文学革命,并任《新青年》杂志编辑。1917年曾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揭开了新文学革命的序幕。1920年,出版了他的我国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五四运动中,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以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1920年,脱离《新青年》,1922年另行创办《努力周报》和《读书杂志》,后又主编《国学季刊》和《现代评论》。1928年与徐志摩、梁实秋等出版《新月》月刊,并创办新月书店,发表文章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1931年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1932年,与蒋廷黻等创办《独立评论》,鼓吹独立自由,支



持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并发表“全盘西化”的主张。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1942年，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最高顾问，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去美国，1958年去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他一生从事对古代文学和哲学的研究，创办刊物，对继承祖国文化遗产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其主要著作均收入《胡适全集》。

《努力周报》发刊词：努力歌^①

胡 适

“这种情形是不会长久的。”

朋友，你错了。

除非你和我 不许他长久，

他是会长久的。

“这种事要有人做。”

朋友，你又错了。

你应该说：

“我不做，等谁去做？”

天下无不可为的事。

直到你和我——自命好人的——

也都说“不可为”，

那才是真不可为了。

阻力吗？

他是黑暗里的一个鬼；
你大胆走上前去，
他就没有了。

朋友们，
我们唱个《努力歌》：
“不怕阻力！
不怕武力！
只怕不努力！
努力！努力！”

“阻力少了！
武力倒了！
中国再造了！
努力！努力！”

注释：

- ① 原载《努力周报》创刊号。《努力周报》，1922年5月7日在北京创刊，胡适主编，是《新青年》分化以后，胡适为贯彻他的主张而创办的。辟有这一周、社论、评论、讨论、论者、通信、小说、杂感等栏目，内容以讨论政治问题为主。第2期发表胡适、梁漱溟等人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提出“好人政府”等主张。1922年9月起曾出增刊《读书杂志》，每月一期，提倡整理国故。1923年10月停刊，共出75期。

1923年10月9日，胡适致信高一涵、陶孟和等四人决定把《努力》停刊，信中谈了停刊的原因，并表示以后看时机仍将复刊（半月刊或月刊）。现全文摘录如下：一涵、孟和、慰慈、牲仁四位同鉴：

《努力》事承你们努力维持，至于今日，使我得安心在山中养病，我真不知道怎样感谢你们才好！

我在烟霞洞住了三个多月，虽然很安逸，很快乐，但我真住的不耐烦了。并不是地方不好，实在是心里不安。一来因为我在大学的功课无人担任；二来因为《努力》久累朋友；三来因为离家日久。所以我决计“下山”来了。（“下山”二字是浙江教育厅长张宗祥用的《思凡》典故！）

四日下山，五日夜到上海，一觉醒来曹锟已当选做总统了。上海一班朋友都不愿意我此时回来，大家讨论的结果，都劝我暂不回京。医生也不赞成我此时出来工作。因为我现在肛门还有一处痔瘤每月要发二三次，每天坐二时以上，背脊便酸痛。

因此，我于七日晚上请叔永夫妇、经农、振飞们来商议一次。结果是：

（一）《努力》暂时停办，将来改组为半月刊或月刊，专从文艺思想方面着力，但亦不放弃政治。俟改组就绪，再行出版。出版当在我恢复健康之时；此时仍继续《读书杂志》。

（二）我此时暂不回京授课，俟一年假满之时再说。

以上二事皆以我病体未复元为主要理由。

停办之事，原非我的本意。但此时谈政治已到“向壁”的地步。若攻击人，则至多不过于全国恶骂之中，加上一骂，有何趣味？若撇开人而谈问题和主张——如全国会议，息兵，宪法之类——则势必引起外人的误解，而为盗贼上条陈也不是我们爱干的事！

辗转寻思，只有暂时停办而另谋换一方向力量的办法。

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

《新青年》的使命在于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这个使命不幸中断了，直到今日。倘使《新青年》继续至今，六年不断地作文学思想革命的事业，影响定然不小了。

我想，我们今后的事业，在于扩充《努力》，使他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

在这个大事业里，《努力》的一班老朋友自然都要加入；我们还应当邀请那些年老而精神不老的朋友，如蔡子民先生、吴稚晖先生，一齐加入。此外，少年的同志，凡愿意朝这个方向努力的，我们都应该尽量欢迎他们加入。

九月廿三日,白云栖回到烟霞洞,看见山前的梅树都憔悴不堪了,曾有一诗如下:

树叶都带着秋容了,
但大多数都还在秋风里撑持着。
只有山前路上的许多梅树,
却早已憔悴的很难看了。
我们不敢笑他们早凋;
让他们早早休息好了,
明年仍赶在百花之先开放罢!

让我这首小诗预祝我们的新《努力》的生命罢!
谢谢你们维持《努力》的热诚和辛苦。

适上。十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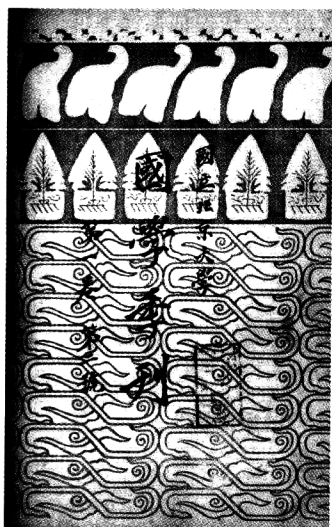
选自宋原放主编、陈江辑注《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
第1卷上册,山东教育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胡 适

近年来,古学的大师渐渐死完了,新起的学者还不曾有什么大成绩表现出来。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期,只有三五个老辈在那里支撑门面。古学界表面上的寂寞,遂使许多人发生无限的悲观。所以有许多老辈遂说,“古学要沦亡了!”“古书不久要无人能读了!”

在这个悲观呼声里,很自然地发出一种没气力的反动的运动来。有些人还以为西洋学术思想的输入是古学沦亡的原因,所以他们至今还在那里抗拒那他们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西洋学术。有些



胡适主编的《国学季刊》

人还以为孔教可以完全代表中国的古文化；所以他们至今还梦想孔教的复兴；甚至于有人竟想抄袭基督教的制度来光复孔教；有些人还以为古文古诗的保存就是古学的保存了；所以他们至今还想压制语体文字的提倡与传播。至于那些静坐扶乩，逃向迷信里去自寻安慰的，更不用说了。

在我们看起来，这些反动都只是旧式学者破产的铁证；这些行为，不但不能挽救他们所忧虑的国学之沦亡，反可以增加国中少年人对于古学的藐视。如果这些举动可以代表国学，国学还是沦亡了更好！

我们平心静气地观察这三百年的古学发达史，再观察眼前国内和国外的学者研究中国学术的现状，我们不但不抱悲观，并且还抱无穷的乐观。我们深信，国学的将来，定能远胜国学的过去；过去的成绩虽然未可厚非，但将来的成绩一定还要更好无数倍。

自从明末到于今，这三百年，诚然可算是古学昌明时代。总括这三百年的成绩，可分这些方面：

（一）整理古书。在这方面，又可分三门。第一，本子的校勘；第二，文字的训诂；第三，真伪的考订。考订真伪一层，乾嘉的大师（除了极少数学者如崔述等之外）都不很注意；只有清初与晚清的学者还肯做这种研究，但方法还不很精密，考订的范围也不大。因此，这一方面的整理，成绩比较的就最少了。然而校勘与训诂两方面的成绩实在不少。戴震、段玉裁、王念孙、阮元、王引之们的治“经”，钱大昕、赵翼、王鸣盛、洪亮吉们的治“史”，王念孙、俞樾、孙诒让们的治“子”；戴震、王念孙、段玉裁、邵晋涵、郝懿行、钱绎、王

筠、朱骏声们的治古词典；都有相当的成绩。重要的古书，经过这许多大师的整理，比三百年前就容易看得多了。我们试拿明刻本的《墨子》来比孙诒让的《墨子闲诂》，若拿二徐的《说文》来比清儒的各种《说文》注，就可以量度这几百年整理古书的成绩了。

（二）发现古书。清朝一代所以能称为古学复兴时期，不单因为训诂校勘的发达，还因为古书发现和翻刻之多。清代中央政府，各省书局，都提倡刻书。私家刻的书更为重要：丛书与单行本；重刊本，精校本，摹刻本，近来的影印本。我们且举一个最微细的例。近三十年内发现与刻行的宋元词集，给文学史家添了多少材料？清初朱彝尊们固然见着不少的词集；但我们今日购买词集之便易，却是清初词人没有享过的福气了。翻刻古书孤本之外，还有辑佚书一项，如《古经解钩沉》、《小学钩沉》、《玉函山房辑佚书》和《四库全书》里那几百种从《永乐大典》辑出的佚书，都是国学史上极重要的贡献。

（三）发现古物。清朝学者好古的风气不限于古书一项；风气所被，遂使古物的发现，记载，收藏，都成了时髦的嗜好，鼎彝，泉币，碑版，壁画，雕塑，古陶器之类；虽缺乏系统的整理，材料确是不少了。最近三十年来，甲骨文字的发现，竟使殷商一代的历史有了地底下的证据，并且给文字学添了无数的最古材料。最近辽阳河南等处石器时代的文化的发现，也是一件极重要的事。

但这三百年的古学的研究，在今日估计起来，实在还有许多缺点。三百年的第一流学者的心思精力都用在这一方面，而究竟还只有这一点结果，也正是因为有这些缺点的缘故。那些缺点，分开来说，也有三层：

（一）研究的范围太狭窄了。这三百年的古学，虽然也有整治史书的，虽然也有研究子书的，但大家的眼光与心力注射的焦点，究竟只在儒家的几部经书。古韵的研究，古词典的研究，古书旧注的研究，子书的研究，都不是为这些材料的本身价值而研究的。一

切古学都只是经学的丫头！内中固然也有婢作夫人的，如古韵学之自成一种专门学问，如子书的研究之渐渐脱离经学的羁绊而独立。但学者的聪明才力被几部经书笼罩了三百年，那是不可讳的事实。况且在这个狭小的范围里，还有许多更狭小的门户界限。有汉学和宋学的分家，有今文和古文的分家；甚至于治一部《诗经》还要舍弃东汉的郑笺而专取西汉的毛传。专攻本是学术进步的一个条件；但清儒狭小研究的范围，却不是没有成见的分攻。他们脱不了“儒书一尊”的成见，故用全力治经学，而只用余力去治他书。他们又脱不了“汉儒去古未远”的成见，故迷信汉人，而排除晚代的学者。他们不知道材料固是愈古愈可信，而见解则后人往往胜过前人；所以他们力排郑樵、朱熹而迷信毛公、郑玄。今文家稍稍能有独立的见解了；但他们打倒了东汉，只落得回到西汉的圈子里去。研究的范围的狭小是清代学术所以不能大发展的一个绝大原因。三五部古书，无论怎样绞来挤去，只有那点精华和糟粕。打倒宋朝的“道士《易》”固然是好事，但打倒了“道士《易》”跳过了魏晋人的“道家《易》”，却回到两汉的“方士《易》”，那就是很不幸的了。《易》的故事如此；《诗书》《春秋》《三礼》的故事也是如此。三百年的心思才力，始终不曾跳出这个狭小的圈子外去。

（二）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解。学问的进步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材料的积聚与剖解；一是材料的组织与贯通。前者须靠精勤的功力，后者全靠综合的理解。清儒有鉴于宋明学者专靠理解的危险，所以努力做朴实的功力而力避主观的见解。这三百年之中，几乎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无史家；只有校注，而无著作。这三句话虽然很重，但我们试除去戴震、章学诚、崔述几个人，就不能不承认这三句话的真实了。章学诚生当乾隆盛时（乾隆，一七三六～一七九五年；章学诚，一七三八～一八〇〇年），大声疾呼地警告当日的学术界道：“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而终身无得于学者，正坐……误执求知之功力，以为

学即在是尔。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指功力以为学，是犹指秫黍以为酒也。”（《文史通义》，《博约》篇）

他又说：“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蚕食叶而不能抽丝。”（《章氏遗书》，“与汪辉祖书”）古人说：“鸳鸯绣取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单把绣成的鸳鸯给人看，而不肯把金针教人，那是不大度的行为。然而天下的人不是人人都能学绣鸳鸯的；多数人只爱看鸳鸯的而不想自己动手去学绣。清朝的学者只是天天一针一针地学绣，始终不肯绣鸳鸯。所以他们尽管辛苦殷勤地做去，而在社会的生活思想上几乎全不发生影响。他们自以为打倒了宋学，然而全国的学校里读的书仍旧是朱熹的《四书集注》、《诗集传》、《易本义》等书。他们自以为打倒了伪古文《尚书》，然而全国村学堂里的学究仍旧继续用蔡沈的《书集传》。三百年第一流的精力，二千四百三十卷的《经解》，仍旧不能替换朱熹一个人的几部启蒙的小书！这也可见单靠功力而不重理解的失败了。

（三）缺乏参考比较的材料。我们试问，这三百年的学者何以这样缺乏理解呢？我们推求这种现象的原因，不能不回到第一层缺点——研究的范围的过于狭小。

宋明的理学家所以富于理解，全因为六朝唐以后佛家与道士的学说弥漫空气中，宋明的理学家全都受了他们的影响，用他们的学说作一种参考比较的资料。宋明的理学家，有了这种比较研究的材料，就像一个近视眼的人戴了近视眼镜一样；从前看不见的，现在都看见了；从前不明白的，现在都明白了。同是一篇《大学》，汉魏的人不很注意他，宋明的人忽然十分尊崇他，把他从《礼记》里抬出来，尊为《四书》之一，推为“初学入德之门”。《中庸》也是如此的。宋明的人戴了佛书的眼镜，望着《大学》、《中庸》，便觉得“明明德”、“诚”、“正心诚意”、“率性之谓道”等等话头都有哲学的意义了。清朝的学者深知戴眼镜的流弊，决意不配眼镜；却不知

道近视而不戴眼镜，同瞎子相差有限。说《诗》的回到《诗序》，说《易》的回到“方士《易》”，说《春秋》的回到《公羊》，可谓“陋”之至了；然而我们试想这一班第一流才士，何以陋到这步田地，可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高明的参考资料吗？他们排斥“异端”；他们得着一部一切经音义，只认得他有保存古韵书古词典的用处；他们拿着一部子书，也只认得他有旁证经文古义的功用。他们只向那几部儒书里兜圈子；兜来兜去，始终脱不了一个“陋”字！打破这个“陋”字，没有别的法子，只有旁搜博采，多寻参考比较的材料。

以上指出的这三百年的古学研究的缺点，不过是随便挑出了几桩重要的。我们的意思并不要菲薄这三百年的成绩；我们只想指出他们的成绩所以不过如此的原因。前人上了当，后人应该学点乖。我们借鉴于先辈学者的成功与失败，然后可以决定我们现在和将来研究国学的方针。我们不研究古学则已；如要想提倡古学的研究，应该注意这几点：

（一）扩大研究的范围。

（二）注意系统的整理。

（三）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

（一）怎样扩大研究的范围呢？“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他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所以我们现在要扩充国学的领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认清了“国故学”的使命，是整理中国一切文化历史，便可以把一切狭隘的门户之见都扫空了。例如治经，郑玄、王肃在历史上固然占一个位置，王弼、何晏也占一个位置，王安石、朱熹也占一个位置，戴震、惠栋也占一个位置，刘逢禄、康有为

也占一个位置。段玉裁曾说：

校经之法，必以贾还贾，以孔还孔，以陆还陆，以杜还杜，以郑还郑，各得其底本，而后判其义理之是非。……不先正《注》，《疏》，《释文》之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立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经韵楼集》，《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

我们可借他论校书的话来总论国学；我们也可以说：整治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还古文家，以今文还今文家；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还他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的是非。不还他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他们的是非，则多误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他们的本来面目，我们决不配评判他们的是非。

这还是专为经学哲学说法。在文学的方面，也有同样的需要。庙堂的文学固可以研究，但草野的文学也应该研究。在历史的眼光里，今日民间小儿女唱的歌谣，和《诗三百篇》有同等的位置；民间流传的小说，和高文典册有同等的位置，吴敬梓、曹霁和关汉卿、马东篱和杜甫、韩愈有同等的位置。故在文学方面，也应该把《三百篇》还给西周、东周之间的无名诗人，把《古乐府》还给汉、魏、六朝的无名诗人，把唐诗还给唐，把词还给五代、两宋，把小曲杂剧还给元朝，把明清的小说还明清。每一个时代，还他那个时代的特长的文学，然后评判他们的文学的价值。不认明每一个时代的特殊文学，则多诬古人而多误今人。

近来颇有人注意戏曲和小说了，但他们的注意仍不能脱离古董家的习气。他们只看得起宋人的小说，而不知道在历史的眼光里，一本石印小字的《平妖传》和一部精刻的残本《五代史平话》有

同样的价值,正如《道藏》里极荒谬的道教经典和《尚书》、《周易》有同等的研究价值。

总之,我们所谓“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只是要我们大家认清国学是国故学,而国故学包括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历史是多方面的:单记朝代兴亡,固不是历史;单有一宗一派,也不成历史。过去种种,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支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

(二)怎样才是“注意系统的整理”呢?学问的进步不单靠积聚材料,还须有系统的整理。系统的整理可分三步说:

(甲)索引式的整理。不曾整理的材料,没有条理,不容易检寻,最能消磨学者有用的精神才力,最足阻碍学术的进步。若想学问进步增加速度,我们须想出法子来解放学者的精力,使他们的精力用在最经济的方面。例如一部《说文解字》,是最没有条理系统的:向来的学者差不多全靠记忆的苦工夫,方才能用这部书。但这种苦工夫是最不经济的;如果有人能把《说文》重新编制一番(部首依笔画,每部的字也依笔画),再加上一个检字的索引(略如《说文通检》或《说文易检》),那就可省许多无谓的时间与记忆力了,又如一部《二十四史》,有了一部《史姓韵编》,可以省多少精力与时间?清代的学者也有见到这一层的;如章学诚说:

窃以典籍浩繁,闻见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无遗,况其下乎?校讎之先,宜尽取四库之藏,中外之籍,择其中之人名地名官阶书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数可稽者,略仿《佩文韵府》之例,悉编为韵;乃于本韵之下,注明原书出处,及先后篇第;自一见再见,以至数千百,皆详注之;藏之馆中,以为群书之总类。至校书之时,遇有疑似之处,即名而求其编韵,因韵而检其本书,参互错综,即可得其至是。此则渊博之儒穷毕生年力而不可究殫者,今即中才校勘可坐收于几席之间,非校讎